

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 成就与地位^{*}

程霖, 毕艳峰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文章将1897—1949年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作为该学科的奠基时期。鉴于奠基时期的学术研究对后续研究的重要影响,以及学术界对该阶段研究的不足和对其评价肯定得不够充分,文章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围绕研究成果、学术争鸣、学术价值以及研究特点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贡献与历史地位,并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10-0026-13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关于经济问题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科学,它的研究任务是揭示和说明中国经济思想(以经济理论为重点)发展演变的规律。^①尽管中国经济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但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学革命的开展以及社会变革现实需要的增强,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经济思想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才开始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1897年,梁启超写成《〈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指出《史记·货殖列传》中蕴藏着丰富的经济思想,而这些经济思想“与西土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明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他还运用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古人的经济思想逐一进行了介绍和分析,^②虽然还很不系统且其中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开始尝试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古人的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先河。这或许是梁启超本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小步,但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一大步。《〈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进入了奠基时期,这一时期从1897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由于奠基时期的学术研究会深刻影响之后的研究路径,因此,深入系统地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收稿日期:2008-07-18

作者简介:程霖(1963—),男,湖北罗田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艳峰(1978—),男,河南沈丘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的总体状况,并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始终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发表的研究成果少且大多是轮廓性的描述,缺乏从学术史的高度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对那一时期学术成就的评价也有些偏低。如赵靖认为:“解放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毕竟是很有限的”,“当时这门学科在研究力量和研究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弱点”。^③出版的一些著作如甘乃光的《先秦经济思想史》、李权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熊梦的《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都是内容单薄的小册子,不论是在资料的发掘、整理上或是对问题的研究、考索上都没有做出值得重视的成就”。^④“从各个方面说,在解放前,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还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发展基础”。^⑤笔者认为,不能低估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就。这一时期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并在研究对象的确定、学术争鸣的开展、研究体系的构建、研究方法的运用、史料的收集整理等方面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对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奠基时期,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老一辈研究者孜孜以求,潜心钻研,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年》一书统计,1900—1949年期间共出版了29本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其中包括9本国人翻译的著作。^⑥但是,笔者发现这些著作没有涵盖有关孙中山先生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而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笔者统计出有关孙中山先生经济思想的研究著作有17部之多。这就意味着从1900年到1949年期间,共出版了至少46本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按照研究内容的差异,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先秦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另一类是关于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除了著作外,奠基时期还发表了461篇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其中概述13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332篇(包括综述51篇、先秦至西汉时期187篇、西汉后期到鸦片战争前94篇)、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116篇。^⑦在刊行的著作、论文中,许多成果具有开创性及较高的学术价值,现择其代表性论著分析评介如下。

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刊行了中国留美博士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ous and His School)。这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学科论著中最早的一部名著”。^⑧同时也是我国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最早著作,曾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是,受英文撰写以及陈焕章政治立场等原因的影响,国人对此知之甚少。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是 1926 年出版的甘乃光的《先秦经济思想史》。全书共分九章,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思想史的意义、特点、研究方法以及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当代学者除了肯定该书具有开创之功外,更多地是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如认为该书作者由于学术偏见及对秦以后经济思想缺乏研究,^⑨否认秦以后的经济思想具有研究价值。^⑩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该书比较早地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其二,该书建立了以人物为分析核心的研究体系;其三,该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如指出了中国经济思想的道德色彩,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经济思想长期滞后于西方的原因。同时,从中外比较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非系统性,这表明甘乃光已经意识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理论范畴的缺乏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1927 年,李权时出版了《中国经济思想小史》。全书共分四章,内容涉及经济制度、欲望、生产、分配、消费、人口以及唯物史观等。笔者认为该书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拓宽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无论是甘乃光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还是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野都局限在先秦诸子百家,没有涉及到后世经济思想,甚至对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思想潮流也未予关注,而李权时提出,“中国历来经济思想之可述者,当推古代与近代”。第二,重视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的价值,强调经济学的经世致用。第三,突出经济制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中国历来经济思想之关于经济制度者特别注重,盖现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即在决定一种最合乎国情和最合乎公理的一种经济制度也。”^⑪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李权时是把经济制度纳入研究范围的第一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1939 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了赵丰田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晚清经济思想的著作。全书共分五篇,主要包括晚清社会的经济状况、国民经济改良诸说、晚清经济思想的来源以及对晚清经济思想的评价。此书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晚清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他总结了晚清 50 年中国经济思想的特点,一是追求国富民强为主流;^⑫二是经济思想与社会、政治、教育等思想融合。^⑬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是比较有创见且符合实际情况的。

1936 年,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详细论述《管子》经济思想的著作。该书共分十章,涉及到管子的成书时间、管子经济思想的基础、货币学说、财政政策、工业政策等。该书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如认为:“《管子》一书,经济思想之丰富,在中国旧籍中几无其比”;^⑭在第二章中,作者从经济发展之阶段、学术思想系统、文字组织和文字证明等多个方面出发,论证了管子为战国时代作品,并且进一步指出,“管子为战国时代作品,乃就管子大部分而言,非全部分也”。^⑮这个观点被后世许多学

者所采纳。

作为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唐庆增于1936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最高成就。全书分十编，内容涉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性质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等。他从构建中国现实经济思想、洞察晚近学说的渊源、掌握中国经济思想专有名词、了解研究方法以及弘扬民族精神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重要性。^⑩他详细分析了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具备的素质，“个人修养须与学识并重，不应有所偏废”。在谈到个人修养时，他认为研究者必须具备超强的忍耐力。在学识方面，他强调研究者不仅要具备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和国学的相关理论和知识，而且要了解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和逻辑学。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承认先秦之后中国经济思想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思想，但他并未因此而妄自菲薄，而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历史上出现过中学西渐的局面，他以法国重农学派为例，从自然法、农产品以及租税等角度，论证了“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西洋各国确曾产生有相当之影响，尤以对于法国之重农学派为最显著，……远较罗马学说、基督教思想、圣经等重要”。^⑪笔者认为，唐庆增不仅提出了法国重农学派学说深受中国经济思想影响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假说，更为重要的是，他倡导了一种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并且有意识地把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纳入到世界经济思想史体系之中，拓宽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综上所述，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成果，这些成果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但大多具有开创性，并从不同角度，在多个方面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开展了比较热烈的学术争鸣

学术争鸣集中反映了学科研究的焦点问题和发展动态，为我们了解和把握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奠基时期，学术界围绕中国经济思想停滞原因、研究对象、土地制度、统制经济政策、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重要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比较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受篇幅所限，择要论述如下：

（一）关于先秦之后中国经济思想长期停滞原因的剖析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甘乃光从经济思想演进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先秦经济思想蓬勃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之后的经济思想却黯淡失色发展缓慢。这个问题成为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焦点。甘乃光认为重农抑商理念的根深蒂固、

个人主义的发展滞后以及国家的疯狂掠夺等导致了汉后经济思想的裹足不前。^⑮唐庆增指出在思想层面,人生观的谬误、重农抑商、过分关注伦理观念以及经济定义的混淆是造成中国经济思想不发达的原因。在事实层面,他认为经济事物之简单、国家地理之阻、历代政府之失著、社会组织之不良以及读书之法之不合是中国经济思想落后的主要原因。^⑯黄汉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学说之不发达与经济组织进步之迟滞,互为表里”;第二,学者讳言“利”。^⑰李大钊站在哲学的高度对中外经济思想作了比较,认为中西方对待欲望的不同态度和满足欲望采取的不同手段,以及自然环境的差异,是造成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的根本原因。^⑱

由上述可见,老一辈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组织和地理环境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先秦之后中国经济思想长期停滞的原因,他们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趋势,另一方面启示我们对经济思想的研究必须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背景,任何单一的、线形的、割裂的分析都是不足为信的。

(二)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基时期,围绕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的许多观点对于明确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启迪和奠基意义。在界定研究对象上,当时学者主要围绕两个层面进行阐述,第一个层面涉及经济思想史学科与邻近学科的区别和联系。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上,甘乃光认为,“经济史即记载某地的工商业或其他经济现象,用客观的描述”,而“经济思想史就是用主观的批评,记载经济思想的起源、发达和影响的记述,并无成学与未成学的区分”。^⑳唐庆增认为经济史“专论学者或政治家对于经济制度所发表之意见”。熊梦指出,“就工商各业以其他经济现象而述人类生活之历程者,是谓经济史。就人类思想而述其于经济事实与经济势力之变迁者,是谓经济学史及经济思想史”。^㉑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史上,甘乃光认为“经济学史是研究已成学的经济思想,即有系统的经济思想”。他进一步指出“经济思想史则范围较大,自古代思想家对于经济发生的言论至已成学后的经济学说无不记载”。^㉒因此,从研究内容上看,“经济学史可以为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㉓熊梦认为“夫学史,重在论有系统之分类知识。思想史乃以各时内经济观念之分析结合及组织为限”。^㉔第二个层面关系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具体内容,甘乃光指出,古代经济学家的言论以及经济学说都可以成为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而熊梦指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观念以及各种经济观念的结合和组织。黄汉认为除了包括经济学说之外,经济政策也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㉕

笔者认为,一方面,老一辈学者从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方面界定了

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学者们初步明确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研究对象，他们认为研究对象既包括未系统化的观念、见解，也包括系统的经济学说，甚至是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客观地讲，奠基时期关于研究对象的讨论大致为后来的相关研究界定了一个选择空间，多数研究都是在这个选择空间内展开细致化的工作。^⑧尽管从学科长期发展的角度以及对当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客观需要来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学科界定应该有范式框架的识别和限制，因为只有在统一的范式框架内，科学才能够实现分析技术的积累和理论的发展”，^⑨但是，对于处于奠基阶段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而言，上述关于研究对象的论述是弥足珍贵的，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对象的选择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独立、成熟和繁荣的起点。

（三）对历代土地制度的讨论

奠基时期对历代土地制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井田制是否存在及其性质的论述。通过对《吕氏春秋》、《左传》等经典著作的考察以及对井田制遗迹的考证，卫聚贤指出，中国古代确实存在井田制。^⑩而齐耀东则认为，对此问题的考证还依赖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现有的史料“既没有确实的方法证其必有，然而也没有方法断其必无”。^⑪关于井田制的性质，学者大多认为井田制是一种国家土地所有制。齐耀东认为井田制度的“唯一要旨在乎收全国土地为公有，而平均分配于各家耕种。”^⑫胡焕庸指出，“人民皆有耕种之土地，产权则属于国家”。^⑬其次，关于对历代限田、均田等制度的讨论。多数研究者认为，历代限田制和均田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抑制豪强的土地兼并。但是，对于这些土地制度的实施效果，学者存在一些争议。徐心芹认为，后魏、北齐、后周、隋、唐等都实行过均田制，但是，由于统治阶级是豪强的代言人以及文人力量的薄弱，这些土地政策都没有得到较好的执行，土地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⑭宾雁则认为，尽管董仲舒的限田措施存在诸多不足，但是，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缓和了社会矛盾。^⑮

土地制度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论述的核心问题之一，上述学者的论述对于揭示井田制及历代限田、均田制的性质和作用具有启发意义，同时也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只有抓住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条主线，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封建社会。这种研究思路也为后世经济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四）对古代国家统制经济政策的讨论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股统制经济思潮，为了从历史角度论证中国是否应该实行统制经济抑或采取自由经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中

国古代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目的与作用进行了探讨。

关于国家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的目的。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充盈国库。李齐芳指出,“国营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增加收入”。^⑤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实行统制经济政策有利于平抑物价,打击奸商,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的稳定。苏乾英指出,统制经济“移富济贫,平准天下货价,而排斥私人之投机,使国计民生臻于安定之域”。^⑥

关于国家统制经济政策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统制经济政策整体上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苏乾英指出,“立意甚善,然其实施实况,则弊端百出”。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商业活动之信用的维提,与夫对于腐败官僚之顾忌,除刘晏稍为注意外,余无顾到者”。另一方面,“经济政治家于私人商业活动每多误解”。^⑦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统制经济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郭垣指出,统制经济政策“不仅在使国家获得充裕的收入,尤在使人民各安所业,不感税负压迫”。^⑧

上述讨论比较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的实质,客观地指出了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的利弊效应,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讨论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统制经济本质的认识,统制经济是一种以超经济手段干预经济体制运行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排斥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如果说,在民族矛盾和对外战争等特殊形势下,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在常态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何认识政府干预型经济体制的弊端,努力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专制传统、正处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民族而言,就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⑨

学术争鸣是促进学术繁荣和学术研究不断趋于深入的重要途径。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学术争鸣不仅有利于后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推动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形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认为,作为较高层次的历史研究,史学史的工作就是要批判、总结史学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史学史的任务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二是研究史学的学术价值。^⑩笔者认为,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初步明确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如前所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奠基时期,学者们初步探讨了经济思想史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和联系,明确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学者还比较深入细致地论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意义。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利于创建中国经济学科。唐庆增指出，创建中国经济学科必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在纵的一方面必须研究我国经济思想与制度之史的发展，在横的一方面则当研究各地经济状况与解决之方案”。^②夏炎德认为，在中国建立经济学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为前提。^③其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利于客观评价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的地位。甘乃光认为研究经济思想史“可知经济思想是连贯的，有系统的”，可以把握“学术进化的途径”，更方便“从事比较研究”，而比较研究则有利于做出正确的评价。^④在客观承认中国经济思想弱势地位的前提下，唐庆增更是以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为例强调了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的地位。

（二）开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体系

奠基时期是一个学科的拓荒时期，该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构建学科的研究体系。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汗牛充栋的史料，名目繁多的学派以及层出不穷的政策措施，如何构建科学的研究体系，从中梳理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并探求其内在的规律，成为奠基时期学者关注的中心问题。在划分派别及代表人物的基础上，学者们大多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以派别和人物分析为核心，阐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尽管后来的部分学者认为这种研究体系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框架，无视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并主张采用“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然而，正如胡寄窗先生指出的那样，“商品—资本”研究模式“不是什么‘框框’，更不是西方经济学说史所特有的框框，而是编写经济思想史所须采取的表达形式”，^⑤这种研究体系不仅适用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⑥

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者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范畴作为编写我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史体系的基础是切合实际的，开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体系，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事实上在现存的所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中，不论是解放前或解放后出版的，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点在解放前后有所区别外，就一般体系而言均不外是按历史人物顺序及其所涉及经济范畴进行编写”。^⑦该体系一方面有助于学者从经济理论的高度系统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各个学派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演变，洞察各个学派思想的差异及其历史传承性；另一方面，运用经济理论范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推动了中国思想史学科的近代化历程，并能够把中国经济思想纳入到世界经济思想的研究之中，使中外经济思想能够在同一个平台、同一种语境下进行比较研究。

除了上述体系外,李权时在《中国经济思想小史》和《现代中国经济思想》两书中建立了专题研究体系。该书把中国古代和现代经济思想划分成消费、生产、交易和分配等个专题,较详细地阐述了各种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⑤总之,在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奠基时期的学者不仅构建了以派别和人物分析为核心的研究体系,而且开创了专题研究的先河,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三)倡导了比较分析和本土化的研究方法

倡导比较分析和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是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鲜明特色。甘乃光指出,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有利于“从事比较研究”。唐庆增认为比较研究“可以采彼之长,补吾之短”。至于比较研究的适用范围以及意义,他们一致认为“一国内各时代固可自为比较,且可拿出来与别国比较”,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可知我国经济思想在世界的位置”。^⑥唐庆增还阐述了比较研究应注意的问题,其一,“对于所比较之学说,先须有一极精密之研究”;其二,“比较时须注意两国作者所处之经济背景”,如果强相比较,必将导致错误的结论。^⑦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贸易、生息等现象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共有的经济现象,而这一点是古代和近代比较研究的出发点。因此,笔者认为,老一辈经济学者之所以倡导比较研究方法,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社会形态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分别具有自身特有的经济范畴,但是不同社会形态必然具备共有的经济范畴。毋庸置疑,对不同社会形态共有经济范畴的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比较分析方法是富有创造性启示意义的,比较分析方法由此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以胡寄窗和巫宝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继承和发扬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导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走向深入,并取得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胡寄窗的《政治经济学前史》(1988 年版)、巫宝三的《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1998 年版)、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1992 年版)等。研究方法本土化方面,黄汉强烈反对仅关注西方经济理论而忽视中国国情的研究方法。“今之学者,不专心以求我国之经济思想,徒徙事于西洋经济思想之研究,不察国内经济状态之背景”,以致“国内经济思想之紊乱,财政行政之无标准”。^⑧他进一步指出,必须把中国国情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如欲解决之,必得研究本国之经济思想,整理之,批评之,以明瞭我国经济思想之背景;同时,研究西洋之经济思想,整理之,批评之,以为他山之助,庶中国之现代经济问题得迎刃而解”。^⑨唐庆增指出,“若研究方法不妥当,贸然以外国的学理作为改革中国制度的工具”,结果必然是错误的。因此,“我们要注意方法,在研究外国经济现象的时候,应以本国的情形作比较,在研究经济理论的时候也就应以本国的情形为参证”,否则,“我们非但不能利用知识,反且将为知识的奴隶”。^⑩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唐庆增和黄汉既强调研究西方经济理

论的重要性,又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中国具体的经济现象,而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恰恰是沟通两者的桥梁。笔者认为,在众多学者对西方经济理论奉若神明、沉醉其中的时候,唐庆增和黄汉的言论振聋发聩,本土化的研究方法至今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四)奠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史科学基础

恩格斯说,任何学科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④中国经济思想史论著水平的高低,不仅决定于研究者经济理论水平的高低,而且也决定于研究者掌握史料的程度。^⑤老一辈学者从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史料的考证以及史料的分析等方面阐述了史料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奠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史科学基础。关于史料的来源,多数研究者认为,古代经济和政治著作、经济政策、历代诏令、奏议、省府县志以及近代传媒都是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取得史料之后,由于古人和现代人均有伪书,即使真书也有托古改制之言,再加上古代印刷术不精,史料字迹模糊,因此,甘乃光认为校勘资料成为史料整理的必要环节,要对史料进行抉择,去伪存真。唐庆增详细阐述了史料整理的方法,他指出“或以作者为单位,或以学说为单位,或以派别为单位,或以时代为单位,各有其弊,不能一概而论”。在具体整理时,可以“先以个人为单位,逢作者思想大体相同之处,提出作为一派之特点,至一时代终了时,再作总结”。“研究某一特殊时期经济思想之特点及趋势,同时更可注意几种重大问题,就各人及各时代各派别之学说比较之,此四种方法,系属相成而非相反,故可并行不悖者也”。^⑥他还阐述了研究史料的四大途径,即分析、解释、比较和批评,这四种途径“当依步骤而逐渐进行,不可紊乱”。^⑦

四、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特点及不足

奠基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缅怀老一辈学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之功的同时,我们还需认真总结他们研究的特点,探求研究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指明前进的方向,而这一点恰恰是学术史研究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态度等几个方面探讨该时期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第一,从研究主体上看,一批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成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力军。从倡导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梁启超到开创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先河的甘乃光,再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唐庆增,他们大都学习和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并把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开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先河。然而,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多数学者在研究领域和视野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值得一提

的是,当时也有少数学者如石决明倡导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应用唯物辩证法,^③只是这种观点没有产生影响,也没有在研究中得到具体运用。

第二,从研究内容上看,奠基时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先秦和近代的经济思想。有关秦汉时期到鸦片战争前的研究非常少,以至于没有出现一本系统性的论著。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有:其一,先秦时期,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都有了最原初的表现形式,再加上春秋战国时期自由的学术氛围,先秦时期经济思想蓬勃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素材。另外,在西方强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导下,弘扬先秦经济思想能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二,由于研究者们普遍对秦以后经济思想缺乏研究,并因此产生了比较深的偏见,认为秦以后的经济思想不具有研究价值,从而放弃把秦以后漫长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三,近代中国是一个巨变的社会,各种经济思潮风起云涌,经济主张和政策层出不穷,客观上为经济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发展的历史,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能够为近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最直接的养分,更能够体现经济学经世致用的性质。

通过对奠基时期研究内容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启示:首先,要对每一历史时期经济思想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做出科学的评价,任何主观的臆断都是不可取的。其次,当时学者对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集中研究启示我们,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决不仅限于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任何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思想都应该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如果说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重点在古代和近代(至 1919 年)的话,那么,新世纪研究的主要范围则将会转向建国前三十年和现、当代。

第三,从研究态度上看,研究者往往具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牵强附会、盲目自大。在奠基时期,由于他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掌握只是一知半解,同时受到阶级属性和研究史料的限制,出于弘扬民族文化和提高民族自尊心的目的,他们往往拿中国古近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近代的经济理论做简单对比,进而认定中国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可与西方近代经济理论相媲美。如黄汉认为《管子》的货币学说与西方近代的货币理论如出一辙,且前者比后者早出现两千多年。另一种是妄自菲薄,否定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价值。如甘乃光对先秦之后的经济思想做出了极端的消极评价,错误地认为先秦之后的经济思想没有研究的价值。笔者认为,这两种研究态度都是不可取的,都不利于深入地开展学术研究。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经济思想的地位和价值不但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③ 本文系程霖主持的上海财经大学“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研究(1897—200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 ①参见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经济学集刊》，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陈绍闻、叶世昌等：《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第46—53页。
- ②②程霖：《二十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9—148页。
- ③④⑤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11页，第9页，第13页。
- ⑥详见谈敏主编：《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 ⑦详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索引（1900—1999）》，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0年版。另据叶坦考证，1949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发表。见叶坦：《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31—141页。
- ⑧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 ⑨④⑤叶世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6期，第70—76页。
-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版，第1页，第3—4页，第1—2页，第5—7页，第2页，第13页，第13页。
- ⑩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例言）》，世界书局1929版，第1页。
- ⑫⑬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版，第315页，第315页。
-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黄汉：《管子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页，第9页，第2—3页，第1—2页，第3页，第3页。
-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详见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5页，第366页，第15—32页，第15页，第38页，第36页，第38页。
- ⑳李大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载《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 ㉑㉒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页，第2—3页。
- ㉓赵晓雷：《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经济学家》，2005年第3期，第30—35页。
- ㉔卫聚贤：《井田的材料》，《学艺》，1935第14卷第4号。
- ㉕㉖齐耀东：《中国历代土地政策述略》，《国立北平大学学报（法学专刊）》，1933年第1卷第2期，第355页，第355页。
- ㉗胡焕庸：《历代土地政策》，《国学商兑》，1933年第1卷第1号，《论坛》第13页。
- ㉘徐心芹：《我国中古“土地公有制”之复兴与废毁》，《朔望半月刊》第4号，1933—1949年（第3卷）。
- ㉙宾雁：《中国重农轻商思想史之史的考察》，《史地丛刊》，1933年第1期。
- ㉚李齐芳：《汉武帝的新经济政策》，《史地丛刊》，1947年第1期。
- 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苏乾英：《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食货（半月刊）》，1936年第3卷第7期，第49页，第49页。

- ③郭垣:《刘晏的战时财政政策》,《财政学报》,1943 第 1 卷第 11 期,第 72 页。
- ④钟祥财:《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史林》,2008 年第 2 期,第 47 页。
- ⑤详见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第 72—77 页。
- ⑥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第 152 页。
- ⑦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 年第 1 期,第 31—40 页。
- ⑧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月刊》,1986 年第 3 期,第 20—27 页。
- ⑩唐庆增:《唐庆增经济演讲集》,世界书局 1933 年版,第 20—21 页。
- 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9 页。
- ⑫叶世昌:《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史料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1 期,第 11—16 页。
- ⑬石决明:《中国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商榷——兼评唐庆增博士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蠡测》,《中国经济》,1934 年第 6 期,第 1—10 页,1934 年第 7 期,第 1—15 页。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of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Preliminary Period

CHEN Lin, BI Yan-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regards the period from 1897 to 1949 as the preliminary period of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In view of the lack of academic researches in the preliminary period and related positive judgments, and also its important effects on subsequent studies, based on the angle of academic history study,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presents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of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preliminary period, focusing on research achievements, academic discussion, academic value an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a few concret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f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Key words: preliminary period;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cademic history study

(责任编辑 金 澜)